

历史 YU WODE XUAN ZE

LISHI 与我的选择



杭州大学出版社

历史与我的选择

杭州大学出版社

历史与我的选择

*

杭州大学出版社出版
(杭州天目山路 34 号)

*

杭州东海电脑排版部排版 浙江富阳印刷厂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 毫米 1/32 11 印张 218 千字
1991 年 4 月第 1 版 199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5000

书号: ISBN 7-81035-098-6/G·042

定 价: 4.40 元

中华英才的闪光足迹

刘群生

“五四”青年节前夕，杭州大学出版社推出《历史与我的选择》、《现实与我的选择》两部新著，我认为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今天，历史已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回顾过去，在我们的华夏大地上，在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留下了一代又一代中华英才的闪光足迹。无论是老一辈革命家，还是新一代优秀分子，他们在自己平凡的人生道路上，都创造着不平凡的业绩。尽管他们职业不同，经历各异，但无论是在历史转折的关头，还是在严峻现实的面前，他们都把自己同祖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祖国高于一切”，是他们共同的人生选择。

《历史与我的选择》和《现实与我的选择》堪称姐妹篇。前者生动地描述了我国著名的老一辈政治

家、军事家、科学家、理论家、作家、艺术家所走过的漫漫人生之路。当我看到他们忧国忧民的一片赤子之心，他们为祖国昌盛而奉献终生的奋斗精神和艰苦创业、呕心沥血的感人事迹时，不禁为之动容。从他们身上，我们强烈地感受到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自信心，学习到他们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操。后者则真实地展现了我国新一代优秀分子的精神风貌。他们大都成长在新中国的红旗下，他们的成才之路，对广大的青年来说，也更具有现实的意义。他们无论是远在异邦深造，还是在家乡的土地上耕耘，都把自己学习到的知识无私地奉献给祖国和人民。他们既有崇高的人生价值目标，又有兢兢业业、脚踏实地的扎实作风，在他们身上，人们看到了我们祖国人才辈出的辉煌前景。

优秀的中国知识分子是中华民族的精华和宝贵的财富，青年是祖国的希望和未来。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一代又一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我衷心地希望广大的青年朋友都能读一读《历史与我的选择》和《现实与我的选择》这两部新著，从书中介绍的这些优秀人物的身上，从他们闪光的足迹中，学会更好地珍惜自己的青春年华，把握自己的人生航向，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用自己美好的青春连接起共和国的今天和明天。

目 录

西行之前

- 黄华访谈录 田 心 整理(1)

在祖国的星座上发光

- 钱学森辗转回国创业记 刘敬智(13)

长征路上女英杰

- 访康克清 李尚志(46)

一度梅花一度春

- 记帅孟奇 吴会琴(54)

从贤淑的贵族夫人到出色的妇女工作者

- 阿沛·才丹卓嘎访问记 李尚志(69)

西出祁连

- 李聚奎将军千里找党记 陈先义(81)

寻求富国兴邦之路

- 陈翰笙自述 康 雪 整理(102)

岱老风范

- 记经济学家、教育学陈岱孙 毛 京(120)

风雨治学七十年

- 记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周谷城 张志哲(129)

走向光明

- “宁都暴动”中的孙毅将军 陈先义(148)

生命的追求

- 记地球物理学家翁文波 聂北茵(162)

艰难的跋涉

- 赵忠尧教授及其高能物理研究 西 竹 整理(178)

我与原子核科学

- 钱三强自述 钱三强(202)

“我愿以身许国”

- 核弹先驱王淦昌纪事 顾迈南(220)

献身于小麦育种事业

- 著名农学家金善宝自述 周 川 整理(231)

为了新的选择

- 唐振绪的苦恼与欢乐 莫 衷(255)

年轻时期的三次抉择

- 夏衍《懒寻旧梦录》摘编 陈 坚 整理(280)

生命之树

- 柯岩答客问 田 心 整理(290)

粉墨春秋话沧桑

- 骆玉笙自述 孟 然 整理(307)

选择人生和艺术的难题

- 记画家张仃 李 梅(327)

西行之前

——黄华访谈录

“五四”前夕，受杭州大学出版社的委托，我们走访了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杰出的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家黄华同志，请他给今天的青年朋友谈谈当年投身革命的一些情况。

黄老今年已是七十八岁高龄，谈起自己怎样由一名燕京大学的学生成长为一名共产党员的经历，他的思维仍是那么敏捷，语音仍是那么有力，令人敬佩不已。下面是我们这次访谈的摘要。

问：黄老，已故的美国著名记者、中

国人民的好朋友斯诺，曾经在他那本风靡全球的《西行漫记》里谈到他的震惊中外的第一次陕北之行时，提到他的两个旅伴：一个年轻人和一个留着大胡子的外国人。那年轻人就是您，对吧？您是怎样走上革命道路的？那个大胡子的外国人又是谁？

答：对，那个年轻人就是我，我那时是燕京大学的一名大学生，那个大胡子的外国人，就是已故的著名国际友人马海德大夫。

关于我是怎样走上革命道路的，这还有个启蒙过程。

问：您接受马克思主义启蒙，最早大约是在什么时候？您为什么信仰共产主义的学说？有没有时代的影响呢？

答：1931年，我原在锦州交通大学预科学习，因为“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沈阳，我随着学校入关，来到北平。我的同学绝大多数都是东北人。他们背井离乡，身受漂泊流浪的痛苦，要求收复东北，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打回老家去的心情非常强烈。我的爱国思想即萌动于此时。我在家乡读初中时，参加过反对“济南惨案”的活动，看过《狂人日记》和党的一些传单。1928年在河南读高中时，我已从当时出版的刊物，如《语丝》、《奔流》、《莽原》上，零星地接触了进步思想。1929年到锦州交大预科学习，那时东北一般学生一方面不满日本窥伺东北，滋长着爱国主义思想；一方面又受东北当局利用“中东路事件”煽起的反苏反共宣传的毒害，敌视苏联和共产主义的情绪随

之增长。我躲开人们的注意，读了自己带去的梅林著的《马克思传》中译本，使我从反帝爱国思想开始要求了解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要求深入认识中国社会。所以我到北平之后，常常到书摊上去寻找进步书籍，看过李达的《唯物辩证法》、日本河上肇的《政治经济学》、鲁迅抨击国民党的杂文和其他一些进步杂志。这使我初步了解了社会发展的规律和阶级斗争的意义，痛恨国民党的投降卖国政策，向往社会主义，向往苏联。

1932年秋天，即“九·一八”事变后一年，我考入燕京大学经济学系，在这个学系的小图书馆中，有斯大林著的《列宁主义问题和列宁主义基础》英文本，这是当时很不容易见到的书籍，我详细阅读了，并把其中要点译成中文，拿给东北大学里我熟识的朋友们看。我们这些人思想接近，往来密切，不但在一起讨论思想进步的书，更多的还是讨论当时的政治形势，从国际谈到国内。

问：据我们所知，“九·一八”之后，北京的青年学生救亡爱国热情十分高涨，听说黄老那时候还会造手榴弹，是吗？

答：为了给自己将来与日寇战斗作准备，我的同学张希尧的确教我制作过手榴弹。记得那是用一个香烟罐子装上炸药和碎玻璃等物制成的，我们拿到圆明园一个荒凉无人的土堆上试放，向远处投掷过去，发出很大的爆炸响声。

1933年，我和同学们在校内组织了一个叫刻苦团的小

型抗日团体，提倡刻苦生活、锻炼身体，准备日后参加东北义勇军打游击。这个点子是从东北大学抗日救国会学来的，他们有类似刻苦团的组织。燕大刻苦团平时不进城，不看电影，早晨起来做体操，穿蓝布大褂，吃最粗糙低廉的饭食，在生活上抱着卧薪尝胆的精神，并且学习进步思想理论，这对于我后来参加革命是一种探索，也是一番锻炼。

问：黄老，您是“一二·九”运动中著名的学生领袖之一，那时您是共产党员吗？北京的学生运动为什么能一下子就发展成为全国性的运动？

答：我是1936年初入党的。1935年秋天，东北大学里的共产党员张希尧曾表示愿意介绍我参加共产党。我说，为了便于工作，希望在“燕京”入党，要求他把我的情况转达给燕京大学党支部。由于当时燕大的党支部还没有成立，所以直到1936年初我才加入共产党。

我们一些左派的学生在1935年5月被燕京大学全校学生选举为燕大学生会负责人，当时我被推举为燕大学生会执行委员会主席。燕京大学虽然是美国教会在中国创办的贵族化的大学，但大多数同学都是爱国的，燕京大学是当时积极参加“一·二九”运动的北平几个大学中的一个。

北平学生运动能够发展成为全国性的运动，并且能够健康、持久地发展下去，有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是东北沦陷、华北五省自治、平津危在旦夕的政治形势，激起了有光荣传统的北方学生的抗日救国热潮。学生运动在北平原先就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因此在“一二·九”、“一二·

“一六”的行动中，队伍一直在扩大，许多学生自发地来参加游行活动。其次是党的《八一宣言》的发表，中央红军北上抗日到达陕北的胜利，北平地下党的党员以及党领导下的进步组织在学生中的活动，像酵母一样，从思想上组织上促成了北平学生运动从半自发的状态发展为有组织、有目标、有纲领的抗日救国行动。复次，北平学生运动来势迅猛，这是由于党在全国的工作。党和爱国人士一直长期进行了宣传组织工作，不但北平连续发动“一二·九”、“一二·一六”两次示威游行和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等活动，在全国各大学和爱国人士中也迅速开展了抗日救国的斗争。最后，学生运动能够持久的发展下去，直到抗日战争中大批学生加入八路军和新四军，加入敌后的抗日武装斗争，这与党中央派遣刘少奇同志到北方，在天津主持北方局工作分不开。刘少奇同志及时地指出学生运动中出现的过“左”倾向和过激行，提出一些很重要的策略，包括统一战线思想，争取到许多校长和教授的同情，也得到了宋哲元的谅解，因而才能持久地坚持下去，巩固和扩大学生运动中的骨干力量，组织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展开了多种多样的活动，直到“七·七”抗战开始，大批学生和各界青年冒着生命危险，冲破国民党的重重封锁，奔赴延安。

问：黄老，您能给我们谈谈当时亲身参加“一·二九”运动的情形吗？

答：我记得，12月9日那天，天色尚未大亮，燕大男女

宿舍就梆声齐鸣，催促大家起床。在刺骨的冷风中，女同学们先于男同学来到南操场集合。全体到齐后，共编成六个队，每队九十人。另外还有纠察队和骑自行车的交通队，组织相当严密。按照原定计划，为了避免警察注意，我们取道小路。哪知出门不久，即遇警察前来阻止，我们就由一部分同学采取包围形势，与他们交涉，另外的同学则乘机继续前进。后来我们又一再受到警察的阻止，都用这种办法对付。

我们从田间走到公路上以后，警察坚持不让通过，于是我们散开，分头前进。为了不使警察传递消息，男同学抱住警察，女同学拖住警察的自行车，许多平时斯斯文文的同学在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的口号声中，力气倍增。

我们的队伍走了十几里，来到了离西直门不远的高梁桥，这里把守的警察很多，设置了三道防线。他们人多势大，态度也比较横蛮，我们仍然用前述的办法，一面由一些人与他们交涉，另外的人实行偷渡。这里的警察急了，动起武来，撕毁我们的校旗和队旗，并殴打学生，我们被迫自卫还击，发生了一次小冲突，几个警察死拉活拖，硬把张兆麟同学拖进西直门外大街他们的区署。

西直门外区署的警察，平时为非作歹，欺压老百姓，就是凭着他们手中有几十条枪，今天的学生不在乎那个，团结起来力量大，那几十条枪就显得渺小了。我们跟着冲进区署，硬把张兆麟抢了出来，警察也没有办法。

我们的队伍到达西直门外，西直门已经关闭起来了。我

们只好站在瓮城外面。此时清华同学的大队沿平绥铁路线过来，大家鼓掌欢迎；北平大学农学院和其他学校的同学来了，大家又鼓掌欢迎，学生愈集愈多，不下两千人。我们不能在那里久等，索性把城外的空地当会场，开起群众大会来。这时有很多想进城进不去的过路人和很多看热闹的市民，由外围逐渐靠近，与学生打成一片，人越来越多。

这个自然形成的群众大会，由张兆麟首先拿起喇叭筒站到城门外一座小土墩上讲话开始。他控诉日本兵在东北的暴行，指责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明确表示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并领着大家呼口号。在张兆麟讲话之后，各校许多同学相继登上这个小土墩讲话，其中尤以清华大学女同学陆瑾讲得最好，最使听众感动，因而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她讲话的那张照片，还被邹韬奋选作《大众生活》杂志的封面。后来又有别的同志讲话，西直门外的群众大会一直开到下午。

在交通断绝和城内电话不通的情形下，我心中非常焦急。因为事前商定：去中南海居仁堂见何应钦时，由燕大学生代表负责当面向他递交请愿书并当众愤怒斥责国民党的投降卖国政策，现在我们一直被阻在城外，没法去完成这个任务，我感到很不安；但是相信别的学校同学同样可以做这件工作，或许还能做得更好，我又放心了。到下午3点钟，何应钦的代表北京市社会局局长雷季尚在西直门城墙内由门缝中向外对各校代表们谈话说：“各位要求各点，已转达何部长；全盘接受，请同学们赶快回校……”当时各校同学饥寒

交迫，疲惫不堪，听见雷季尚的话，虽然不相信，但姑妄听之，总比没有答复为好。于是学生们高呼口号，分别整队返校。回校后，我们在《十二九·特刊》上写道：“我们这次请愿，是一个民族解放运动的开始，而不是一个终结。这仅仅是一个小火花；但是这小小火花，将会燃起全国民众革命的烈火。”

问：黄老，听说在“一·二九”运动中，您曾经被捕过，是吗？

答：记得那是在“一二·一六”大示威那一天，我们接受了“一二·九”未能进得了西直门的教训，一方面仍以大队叩西直门（实际上是破西便门铁路门入城），另外由燕京、清华各派三十名同学在前一天进城埋伏，一定要和城里的同学们一齐参加新的战斗。根据学生大会决定，由我和燕京的三十名同学连夜进城，有的住在同学家，有的住在灯市口燕大校友会，我带了宣传品住在灯市口校友会里，人多床少，工友们热情地帮助铺了草席，多数人打地铺过夜。第二天一早就到了预定集合地—西直门内北沟沿。到了9点，在东北大学宿舍排成队伍，燕京三十人在前，清华三十人居中，后面是数百人的东北大学的大队。这个队伍一面游行示威，一面发动沿路的学生来参加游行，队伍不断扩大。当我们顺北沟沿向南经过平民中学时，因为这个学校是红漆大门旧式房屋，一进一进的，很深，我到了最后一进的课室找学生出来参加游行，出来迟了一些，一出校门便被警察捉住，

押送到北平市公安局，这是我的第一次被捕。

后来，我被关进公安局一个小院子里一间孤零零的平房，屋子里有个大炕，陆续被抓并关在这里的有六七个同学，其中有清华大学的王永兴，还有一个姓刘的记者，已记不起他的名字了。门口有一个老警察抱着步枪坐在凳子上，态度有些随随便便。我见窗玻璃上凝聚了水蒸气，就在那上面用拉丁化新文字写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标语。这次我被关在这里只有一个星期，没受审讯，便与另外几个被捕的同学，被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和其他几个大学校长联合保释出来。

我被释放回学校没几天，便在1936年1月4日参加了南下扩大宣传活动。南下扩大宣传回来以后，学生运动进入一个艰难困苦的低潮时期。

我第二次被捕是在郭清同学的追悼会上。时间是1936年3月31日。郭清是河北省立高中（现改为北京第17中学）的十八岁学生，因被捕后挨打，病重垂死，公安局一直拒绝把他送医院治疗，到了快断气的时候才送出来，于3月9日惨死。

3月31日上午9点，在沙滩北大三院礼堂举行了郭清追悼会，到会的有一千多人。正当追悼会在礼堂进行的时候，国民党军警已经持枪荷弹，把北大三院团团围住，禁止出入。与此同时，北大校长蒋梦麟以开除学籍威胁韩天石等北大学生会负责人，强迫韩天石等解散追悼会，停止北大学生会活动。韩天石等自然拒绝蒋梦麟的无理要求，会场上同学

们见此情形，群情沸腾，愤怒难以抑止，一当有人提议抬棺游行，立刻得到全场同学的热烈响应。在北大三院和孔德中学之间原有一门相通，后来此门用砖垒死了，这时同学们推倒这一堵墙，便由孔德中学走到街上游行。许多同学抢着拿追悼郭清同学的大字横幅，抢着拿花圈、抬棺材，唱着《五月的鲜花》等悲愤的歌曲。

当我们来到南池子的时候，前面有军警阻拦，并有穿皮革大衣的警察骑着摩托车，向我们撞来。因为队伍前面是燕京、清华和城里几个大学组成的主力队伍，尚能和他们抵挡一阵；尾部相当一部分是中学生，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场面，被军警一冲便乱了。后面一乱，前面的队伍也就被冲散了，花圈被抢走了，棺材被抢走了。军警逢人就乱打乱捉。

我只好闪入路边一个小胡同，不巧这是个死胡同，走过去就出不来，而且也有警察，在一个茶馆前面，警察追上来便拳打脚踢把我抓住了，把我手腕上带的手表的玻璃蒙子打碎了。这一天我穿的是灰布大褂，不是学生装束。警察问：“你是干什么的？是学生闹事的吗？”我说：“不是，我是表坏了，表蒙子破了，我去修理表的。”警察不管那些，把我拉进派出所，我就这样被捕了。

问：黄老，请您谈谈当时您在狱中的情况好吗？

答：那时候，爱国青年的热情高涨，每个人都带上四斤多重的脚镣，可是我们还坚持斗争呢！我在狱中还办了张秘密小报《牢狱之花》——这是沿用德国一本小说的名字作为